

新加坡的傳播教育：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發展個案*

郝曉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退休教授

摘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間發展成為一所國際知名的傳播學院，其經驗值得其他亞洲傳播學院借鑒。與兩岸三地的傳播院系相比，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由於新加坡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影響和對國外師資的依賴，在教學和科學研究方面更加國際化，這使得學院在國際排名中受益。相對自由的學術環境，嚴格的考核制度和銳意改革的進取精神也是保證學院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傳播教育、國際化、學術自由、考核制度

* 本文作者從 1993 年起至 2018 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任教，先後擔任系主任、副院長和大學學術委員會參議院主席及指導委員會成員等職務。文中的大量資料來源於作者在學院和大學的管理經驗。

** Email: txmhao@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9 月 16 日

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遠離兩岸三地的大中華圈，但作為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仍會被看作是大中華文化圈的一分子 (Harding, 1993, p. 660; Wang, 1993)。由於華人占新加坡總人口的 76.1%，新加坡也自然繼承了相當程度的華族文化傳統，其華文教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當地華社在 1829 年開設的方言學校。在上世紀 50 年代華文教育的全盛期，新加坡共有 349 所華校，擁有 6 萬 7 千多名學生，占當時全國學生總數的 57.9% (張汐瑩，2016 年 7 月 11 日)。在中小學華文教育高度發展的同時，由東南亞華僑共同創辦的南洋大學 1955 年在新加坡成立，成為歷史上兩岸三地之外唯一一所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大學。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強調英語為全民共同語，把英語作為政府用語和商業用語，使英語最終取代各族群的母語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語言。南洋大學 1980 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文獻館，2018)。中小學教育的最後一所華校也在 1985 年停辦 (張汐瑩，2016 年 7 月 11 日)。新加坡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其高等教育不單在教學語言上，而且在教學理念和方式上與兩岸三地的高等教育有著很大區別，在傳播教育方面亦是如此。本文介紹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發展歷程。資料來源除了文獻分析，主要依靠個人參與觀察和與建院工作同事們的訪談。

壹、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建立的背景

新加坡的教育，特別是其高等教育，早期是以英國的教育體系為主導，更強調專業性的培訓，而不是北美教育體系所提倡的通識教育。學校的任務不單是要保證學生在校獲得就業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也要通過嚴格的考試制度分流學生，達到因材施教和選拔人才的目的。小學生六年級畢業要參加全國統一考試，根據會考成績選擇上不同的中學或工藝學校。中學生四年畢業時要參加新加坡教育部和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局聯合主辦的劍橋 O 水準考試，根據考試成績選擇上兩年制的初級學院或三年制的理工學院。初級學院類似於中國的高中，課程分文理兩科，畢業生參加劍橋 A 水準考試作為大學入學標準 (Kuo & Lee, 2006)。理工學院學制三年，類似中國的大專，負責培養就業市場所需的專業人才，前百分之十的優秀畢業生也可進入本地大學完成專轉本的課程。這種層層考試的制度確保最終進入本地大學的學生是同輩中學業方面的佼佼者。

新加坡的大學教育可以追溯到 1905 年建立的一所醫學院。但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新加坡大學教育並沒有得到很大發展。在英國統治者看來，對殖民地居民

過多的教育會威脅其統治，高等教育只應有極少數人享受 (Goh & Tan, 2008)。所以直到上個世紀中葉，新加坡才先後出現了在 1949 年通過兩所高等教育學院合併成立的馬來亞大學（1962 年更名為新加坡大學）和在 1955 年成立的南洋大學。在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 1980 年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後，新加坡政府 1981 年在原南洋大學校園內設立了南洋理工學院，並在 1991 年將這所大專學府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 (HistorySG, 2015)。除了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這兩所研究型綜合性大學外，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又先後開辦了新加坡管理大學、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新加坡理工大學和新躍社科大學等專科性大學。

在上世紀 90 年代之前，新加坡在大學層次與傳播學相關的課程寥寥無幾。在 70 年代初，新加坡大學的社會學系和南洋大學的政治與公共管理系曾開設過幾門大眾傳播課程。南洋大學的政治與公共管理系在 1975 年還開辦了大眾傳播專業，但當南洋大學 1980 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後，這個先後培養了大約百名畢業生的專業也就關閉了 (Kuo & Lee, 2006)。直到 1989 年，義安理工學院才又開設了頒發大專文憑的大眾傳播專業以滿足公眾和傳媒業界的需求 (Hukill, 1994)。

新加坡的媒體業從獨立後到上世紀 90 年代初有了迅速的發展。在報業方面，新加坡既有 170 多年歷史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也有針對不同族群以華文、馬來文和淡米爾文發行的報章。1984 年成立的報業控股是亞洲最大的媒體集團之一，擁有在新加坡發行的所有主要報章。在 80 年代末，新加坡報紙的發行量達到總人口的 29.4%。與此同時，從 1936 年開始的電臺廣播和從 1963 年開始的電視廣播也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達到發展的高峰，居民擁有收音機和電視機執照的比例分別達到 23.8% 和 19.8% (Kuo, 1991)。從上世紀 90 年代到本世紀初，新加坡媒體的年增長率達到 6-7% (APAC Outlook, n.d.)。在本地媒體蓬勃發展的同時，新加坡政府也努力吸引外國媒體到新加坡建立區域性總部，力圖把新加坡發展成為區域性大眾傳媒中心（〈楊榮文：鼓勵國內外傳媒公司投資，我國希望發展成為區域性大眾傳播中心〉，1994 年 5 月 11 日）。自上世紀 90 年代起，新加坡已經吸引了亞太探索網路（Discovery Networks Asia Pacifi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亞太頻道（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 Asia Pacific）和 Entertainment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ESPN）Star Sports 等眾多全球性廣播公司入駐（新加坡經濟發展局，2018）。在媒體業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新聞傳播教育也自然而然地被提上政府教育規劃的日程。在義安理工學院開設大眾傳播課程不久，新加坡國立大學也在其人文社會科學院建立大眾傳播

系，從 1991 年開始招生，但這個系不久就被南洋理工大學新開辦的傳播學院所取代 (Kuo & Lee, 2006)。

新加坡政府 1991 年在原南洋大學校址建立南洋理工大學以滿足日益蓬勃發展的新加坡經濟對高等人才的需要。南洋理工大學在創建初期是一所只有工程、應用科學和財會三個學科，以工科為主的學校，但工科出身的校長詹道存博士卻希望引進一些與工科完全不同的學科來擴大學校的多樣化，向綜合性大學發展。最終，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南洋理工大學 1992 年設立傳播學院，原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系系主任郭振羽教授被任命為傳播學院的首任院長 (Cham, 2014, pp. 96-97)。

在新加坡的高等學府創辦一個培養新聞傳播專業人才的科目曾受到多方質疑。新加坡新聞媒體時任領導層中鮮有畢業於新聞傳播科系的，新聞從業員中眾多佼佼者也不是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的，因此業界並不看好新聞傳播教育。除了內部質疑外，國際上的質疑更為強烈（楊倩蓉，2010）。新加坡一向被認為是缺少新聞自由的國家，在新加坡設立的傳播學院在教學上是否會受限於本國的新聞體制？學生能否培養成為求真求實，忠於新聞操守的新聞工作者？其教職員能否自由地傳授知識和研究相關新聞傳播課題？這些問題都為學院在教師招聘和建立學生海外交流專案方面帶來一定困難。

由於新加坡在大學層次除了南洋大學和國立大學設立過短暫課程並沒有建立起傳播教育的傳統，學院在課程設置上參考了世界各地大學，特別是北美新聞傳播院系的課程。學院之初設立了新聞、廣播電視、公共與促銷傳播和傳播研究四個系。本科生課程採取在通識教育基礎上進行專業化培訓的模式。學生在四年學制的前兩年修讀統一課程，幫助學生在進入專業學習之前全面瞭解新聞、廣播電視、影像、廣告、公關、傳播研究以及多媒體技術所涉及的社會背景、理論與實踐。與此同時，學生還要修讀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東南亞政治、當代世界和新加坡社會等通識課程。學生在第三年進入不同的科系修讀專業課程；專業教學力求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尋求平衡，除了課堂教學，學生還參與校園報紙、有線廣播和電視的採編和節目製作。在進入專業課程的後兩年中，學生要到媒體全職實習六個月，並在最後一年學習期間完成系列新聞報導、廣播電視專題節目、電影、宣傳策劃和研究報告等題材的畢業專案 (Kuo & Lee, 2006)。

在本科生 1993 年入學的同時，學院開始招收以研究為主的碩士生，兩年後開始招收博士生。從 1996 年起，學院為業界人士開辦了以授課為主的大眾傳播碩士課程。在 2001 年，原屬電腦學院的資訊學系併入學院，成為學院的

第五個系，學院也從傳播學院更名為傳播與資訊學院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WKWSCI], 2020a)。資訊學系以培養研究生為主，開辦資訊學、資訊系統和知識管理等碩士課程，近年來也為傳播學的本科生開設資訊處理方面的課程。

雖然新加坡政府和南洋理工大學並沒有給學院的發展規定明確目標，但學院的領導層從首任院長郭振羽教授開始就努力以國際視野發展這所全新的學院。建院初期，學院領導層通過和教師協商，確立了把學院辦成一所「亞洲一流，國際知名」的傳播學院的目標 (WKWSCI, 2020b)。在強調教書育人的同時，學院把通過學術研究提升知識和服務社會作為學院的重要任務。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學院不但培養了一批批受到新加坡乃至國際傳媒業界歡迎的畢業生，也在科學研究（簡稱科研）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績，眾多科研成果發表在一流的國際學術刊物上，大大提高了學院的國際知名度。在 2019 年，學院在 QS 世界大學專科排名榜傳播媒體類學科中名列全球第八，亞洲第一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9)，在上海軟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榜上名列新聞傳播學類全球第二十、亞洲第一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2019)。

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亞洲傳媒業大發展的時期，同時也見證了新聞傳播教育在亞洲的蓬勃發展，一些傳統的新聞傳播學系擴大規模升格為學院或大學，愈來愈多的大學開設獨立的新聞傳播院系。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有多所歷史悠久的新聞傳播院系，無論是在辦學經驗和國際知名度方面都優於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這樣一所新成立的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能在不到 30 年的時間內從無到有，在強調國際聲望的 QS 排名和強調學術研究成果的上海軟科排名中名列亞洲前茅可謂是個奇跡。雖然這些學科排名不能全面反映一所院校的教學與研究成果，但好的排名不單是對大學或學科建設的一種肯定，也為學校帶來更多資源，是辦學者不可忽視的一項指標。本文將在下面具體討論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學科排名方面取得斐然成績的一些重要因素。

貳、辦學基本條件的建設

辦好高等教育離不開三項重要條件，即大樓、大師和優秀的學生來源。大樓不單單是指教學樓舍的建設，也泛指教學所需的其他資源，包括足夠的財力用於支付教師優厚的薪金和開展國際交流項目等。雖然「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之謂也」，但原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講這番話時恰恰是在清華園的教學基礎設施已

基本完成之時（陳先哲，2017年5月2日）。高等教育的成敗雖然最終取決於教師和學生的優劣，但充足的辦學資源是築巢引鳳的必要條件。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建院開始就得到政府和校方的有力支持，學院成為南洋理工大學眾學院中第一個擁有獨立教學辦公大樓的學院，配有一整套在當時可以與世界頂尖傳播學院媲美的教學設施。學院也先後開辦了即有印刷版也有網路版的報紙、有線電視和電臺作為學生實踐課堂知識的平臺。除了政府投資外，學院也受到業界的大力支持，先後通過業界的捐助加政府的補貼建立了黃金輝和邵氏基金講座教授的職位。在新聞工作者出身的新加坡第四任總統黃金輝博士2005年過世後，學院在2006年通過用他的名字為學院冠名的方式向社會募捐，為學院籌得2千7百萬新幣的發展基金(WKWSCI, 2020a)。學院目前可以享用的基金共有31項，其中10個基金由學院自行管理(WKWSCI, 2019a)。

傳播學大師對於一所位處亞洲的新學院來說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雖然學院可以利用已有的講座教授職位聘請美國的Everett Rogers和臺灣的汪琪等知名教授到學院短期任教，但學院教師隊伍的核心骨幹主要靠自己培養。由於新加坡沒有傳播教育的傳統，在海外攻讀傳播學博士學位的新加坡人寥寥無幾。雖然學院在建院初期也成功招募到個別從海外學成歸來的新加坡同事，但新加坡籍的教師在學院中屬於少數。學院的教師隊伍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國際化的團隊，在學院先後任教過的教師來自全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來自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印度、中國、臺灣、香港、斯里蘭卡、韓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法國、塞爾維亞和新加坡的學者。雖然近年來學院也聘請了一些資深教授加入學院的教師團隊，但更多還是依靠新畢業的年輕教師作為教學和科研的骨幹力量。在聘請教師方面，學院要求被聘用者具有相關的博士學位，優先考慮有亞洲背景或經驗的應聘者（擷取自郭振羽，2019年4月11日個人訪談）。隨著學院知名度的提高，應聘者從最初一個職位只有幾個人報名發展到今天幾十個人報名，使學院在聘任教師上有了更多選擇。

受聘教師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相當一部分人最終會由於種種原因選擇離開，但學院努力為他們提供條件，讓他們在學院任教期間在教學與研究方面得到長足的發展。為了提升大學的教學和科研的發展，新加坡政府2005年開始對本地大學進行了結構性和企業化改革(Lee & Gopinathan, 2008)。南洋理工大學從新加坡教育部管轄的學校改為自主大學，並在2007年開始對大學的管理體系進行全面改革。改革中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對教師的任聘和升等制度進行全面更新，以合同制為主的教師聘用體系被終身教職體系所取代。所有在職教師都受到嚴格的評

審，一些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達不到學校要求的教師不被續約，騰出更多職位聘請新的教師 (Andersson & Mayer, 2014)。新聘任的教師面臨的是同美國大學一樣的終身教職制度，一名助理教授在終身教職的預備期（開始是九年後改為七年）內要發表一定數量和品質的研究成果才能被提升為副教授並獲得終身教職，否則將在預備期結束後離開崗位。由於新加坡僅有南洋理工大學和國立大學開設傳播專業而雙方又不接受對方不被續約的教師，這無疑為年輕的助理教授們帶來巨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學院為年輕教師提供更多有利於他們集中精力開展學術研究的條件。助理教授在學院工作的前三年一般不參與學院的行政管理工作，在教學量上也獲得減免。從這些年的經驗看，年輕的助理教授們已經成為學院科研的重要力量，每年發表的論文在整個學院發表的論文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對於這些年輕教師來說，終身教職的預備期可能是他們教學生涯中最辛苦的階段，但也是在科研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的重要時期。最終能夠在完成預備期後獲得升等和終身教職的教師同時也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奠定了一定的學術地位，為長期學術發展打下良好基礎。一些出色的年輕教師在預備期間就被其他大學用終身教職和升等挖走，而那些沒能留下的教師一般也能在預備期發表相當數量的科研成果，比較容易地在其他國家找到新的職位。

作為辦學的必要條件，良好的生源同樣是學院成功的保障。在新加坡公立大學就讀的學生絕大部分來源於本地的初級學院，根據劍橋 A 水準考試成績進入大學，部分頂尖的理工學院畢業生也可根據理工學院的畢業成績被大學錄取 (Kuo & Lee, 2006)。公立大學的外籍學生占本科生的比例在 2010 年以前曾達到 20%，但隨著招生數量的擴大，這個比例已逐步下降到 10% (gov.sg, 2018)，多數修讀本科的外籍學生是來自馬來西亞、中國和印度的新加坡政府獎學金獲得者。但在傳播學院，修讀本科的外籍學生少之又少，一方面是因為傳播學對學生英文讀寫能力要求高，報考的外籍學生數量少；另一方面是因為學院對外籍考生在錄取分數上有更高要求。

在高等教育方面，新加坡政府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認為過多的大學畢業生不利於合理的社會分工，有意控制大學畢業生占人口的比例 (Hugo, 2017, May 11)。在 1990–2000 年間，同齡學生中只有 15–21% 的人能夠進入本地大學學習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6, p. 62)。雖然這個比例在逐年增加，但政府明確表示會將同齡學生的大學入學比率控制在 30–40% 之間 (Cheong, 2017, May 4)。這一政策也保證了在新加坡大學就讀的學生在學業方面是同輩中的佼佼者。

學院在招生方面採取開放的政策，既招收初級學院畢業的文科生，也招收理科生。建院幾年後，學院也開始招收部分理工學院的優秀畢業生。作為一所新的文科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從一開始就吸引了大批報名者。在第一屆錄取的96名學生中，很多學生的劍橋A水準考試成績可以讓他們報考更加熱門的法學院和商學院，甚至個別可以報考醫學院的學生也選擇了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擷取自郭振羽，2019年4月11日個人訪談）。以錄取成績的截點來看，學院初期錄取的學生屬於同屆劍橋A水準前15–20%的考生。近年來，新加坡新添了四所大學和更多的科系，學生在報考大學和專業上有了更多選擇，但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仍能吸引眾多優秀學生入學，本科生錄取的分數線在文科院系中始終名列前茅。

黃金輝傳播學院有別於兩岸三地傳播學院的重要一點是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雖然新加坡的中小學實行雙語教育，但因為主要教學語言是英文，所以本地學生的英文水準一般高於母語的水準。除個別來自馬來西亞和中國的學生外，學院招收的本地學生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熟練地用中文寫作並在畢業後加入本地的華文媒體。作為一所以英文為教學媒介的傳播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與兩岸三地傳播學院的學生相比在學習和研究方面有一些優勢，他們更容易接觸傳播學的新內容，閱讀更多的教科書和參考資料，也更容易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國際發表。從多年學生海外交流情況來看，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可以和海外頂尖傳播學院的學生媲美（擷取自郭振羽，2019年4月11日個人訪談）。

良好的生源是學院辦學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許多教師願意在學院長期任教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學院第一批學生在1997年畢業後的短短幾年時間內，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就通過他們的實習和就業改變了業界對專科傳播教育的疑問，本地的新聞傳播機構大量雇用學院的畢業生，愈來愈多的校友成為本地新聞傳播業界的中高層管理者。

參、教學和科研的國際化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能夠在不同的國際學科排名中處於亞洲領先的地位與其教學和研究的高度國際化分不開。如前所述，在學院創辦之前新加坡沒有系統的傳播教育，自然也無新聞傳播教育傳統可言。所以，學院在學院架構和課程設置上無規可循，一切從頭開始。學院初建時期，新加坡大學的教育體系以英式為主，但傳播學院的設計並沒有以英國傳播教育體系為模式，而是參考了國際上不

同傳播院系的架構和課程設置（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由於當時的南洋理工大學還是一所以工科為主，輔以商科和財會的大學，大學無法提供更多適合傳播專業的通識課程。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學院創建初期在院內開設了相當數量的社會科學類和綜合性傳播學課程作為通識課程供學生在一、二年級修讀（郭振羽，2019）。隨著更多自然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院系在南洋理工大學的開辦，傳播學院學生所修讀的課程更加向通識方面發展。專科教育的課程安排與國際通行的傳播學課程安排相似，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生既要掌握傳播的基本技能，也要懂得傳播的社會效應，以理論指導實踐。

在課程設置以外，教學的國際化更多是通過教學實踐來體現的。如前所說，學院的絕大部分教師都來自海外，既有來自歐美的教師，也有在歐美獲得學位但出身於亞洲的教師。在教學上，學院對教學模式和方式沒有統一規定也不對新入職教師進行統一培訓，而是完全放手讓教師根據課程大綱按照他們對傳播學的理解和經驗授課。這樣做的結果有助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僅能以新加坡的視野看待傳播中的問題和解決方法，同時也能跳出新加坡制度的局限從不同角度學習和思考問題。來自海外的教師在與學生的互動中也使自己的知識更好地和本地經驗相結合，豐富了教學內容與觀點。

教學的國際化另一個重要途徑是學院的海外交流計畫。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社會，也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大都市，但在新加坡這樣一個島國長大的孩子對海外的瞭解是有限的。在全球化高速發展的當今世界，缺少大的國際視野對傳播專業人士來說是致命的缺陷。建院伊始，學院領導就努力發展學生交流項目，從第一屆學生開始就有超過 10% 的學生到美國的一些大學交流學習，這類交流項目逐步擴大到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洲和歐洲等地。海外交流項目不但幫助學生擴展了視野，也通過學生在海外學習的優異表現提高了學院的國際聲譽和知名度。近年來，學院自行開展的交流項目已被納入大學的整體交流計畫，整個南洋理工大學在全球共有三百多個合作夥伴，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海外交流機會。除了到海外的教育機構和媒體學習和實習外，學院也開辦多種海外短期教學和實踐課程。目前已有 70% 的本科生能夠在校學習期間通過各種方式獲得海外學習和實踐的經驗 (WKWSCl, 2019b)。教學的國際化和海外交流經驗為學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畢業生不僅很容易地融入新加坡的媒體環境，也能勝任在海外的新聞傳播工作。不少畢業生成為駐外記者或加入海外的媒體和傳播機構。

學院從建院開始就努力與海外的教育機構和學術團體建立關係，通過交流合作擴大學院的知名度和與海外機構合作發展的機會。例如，學院與中國新聞史

學會和華中科技大學從 1995 年聯合舉辦的「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已經在中國內地、臺灣、香港和新加坡先後舉辦十一屆，成為一個學術交流的品牌。學院也分別在 2000 年和 2010 年承辦了國際傳媒與傳播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和國際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年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傳播學者有機會認識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 (WKWSCl, 2020a)。

學院的國際化也體現在科研成果的發表途徑上。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雖然有高品質的教育和科研機構，但其科研人員和可發表科研成果的數量並不足以支撐以發表本國科研成果為主的學術刊物，傳播學作為一個小學科更是如此。因此，新加坡的傳播學者不能像中國大陸、臺灣、韓國、日本的傳播學者那樣有眾多的本土學術刊物作為發表科研成果的途徑，他們只能把論文投向國際性學術期刊，這當然給學院師生發表論文增加難度，但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學院的國際知名度。學院師生平均每年在國際刊物發表的論文多達一、二百篇，其中相當數量的論文發表在不同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上。多年以來，學院也積極鼓勵和資助教師和學生參加大型國際會議。例如，學院師生每年都在論文接受率較低的國際傳播協會的年會上發表數十篇論文，是參會人員最多的傳播學院之一，學院在國際傳播協會年會上舉辦的「南洋招待會」已成為學院師生與國際傳播學者交流的一個重要平臺。

學院成立後，郭振羽教授把他和亞洲傳媒資訊與傳播中心（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在 1990 年創辦的《亞洲傳播學報》（*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引入學院，成為學院和亞洲傳媒資訊與傳播中心合辦的刊物。學院的多名教師長期參與學報的編輯工作，經過 20 多年的努力，《亞洲傳播學報》已被社會科學檢索（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等眾多資料庫收藏，成為展示亞洲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平臺，擴大了學院在本區域和國際傳播學界的影響力（郝曉鳴、池見星，2012 年 11 月 28 日）。

肆、學術自由與嚴格的考核制度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成立之初受到外界質疑的一個主要方面是學院在教學與科研上能否做到學術自由。在外界看來，新加坡有著高度管控的媒體環境，媒體自我審查非常普遍，就連網上的內容也受到限制（Singapore profile—Media, 2017, September 5）。雖然新加坡在眾多國際排名處於領先的地位，但在無邊界記

者組織編輯的新聞自由度排名中長期落後，在最新的 2019 年排名中，新加坡在 180 個國家中名列第 151 位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9)。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傳播學院的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新聞、廣播和電視課程能否不受限於新加坡自身的媒體環境，讓學生在瞭解新加坡媒體生態環境的同時，也瞭解世界上其他新聞體制的生存哲理和實踐方式對學院無疑是個挑戰。

建院初期，學院在教學上首先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讓一個深受英國教學傳統影響，有著極其嚴格的教學管理方式的工科大學接受一個強調獨創性，反對循規蹈矩的異類學科。例如，作為工科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對考試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每一科考試不但要有考題，而且要有面面俱到的標準答案，分數精確到每一個要點的分值。更為甚者，所有考題、答案和評分標準要由同系教師一起討論通過。這樣的考試方法顯然不適用於傳播學這樣一個學科，時任院長郭振羽教授成功說服校領導，不在傳播學院推行這樣的考試方法。傳播學院的各科考題雖然也要按大學規定經系主任和主管教學的院領導過目，但審查的重點放在考試題的出題方式和文字表述上，而不是試題內容和答案（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

作為傳播學院，出版校園報紙和開辦廣播電視節目作為學生實踐的平臺必不可少。根據新加坡的法規，學院順利開辦了中英文雙語的校園報紙《南洋紀事報》(Nanyang Chronicle)，但廣播電視節目只能以有線的方式在校園內播放。校園報紙和廣播電視節目以報導校內事物為主，自然包括對學校主管部門乃至學生會的監督和批評性報導，因而也會引起主管部門和學生會個別領導的不滿，時常有人力圖通過學院領導和指導教師向學生記者和編輯施壓，禁止或改變對某些事情的報導。面對這種情況，學院領導和指導教師總是耐心地向對方解釋校園媒體的責任以及學生記者和編輯的報導自由和權利，同時邀請對方接受學生記者的採訪讓他們在報導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大學領導對學生主辦的報紙和廣播電視節目採取了相當寬容的態度，當有個別部門領導對學生記者的報導不滿狀告大學領導時，校長詹道存博士就曾出面做協調工作（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

在新加坡校園辦報和廣播如同本地媒體一樣會受到外來的壓力。《南洋紀事報》從 1994 年創辦至今真正受到外來新聞審查的威脅只有一次。2008 年，新加坡反對黨民主黨的領導人不請自來到訪新加坡的大學，向學生宣講該黨綱領和發放傳單。校方第一次直接插手《南洋紀事報》的新聞報導，下令撤掉有關反對黨領導人到校訪問和接受採訪的文章，並同時停播已經在校內有線電視播放的相

關報導。校方對學生新聞媒體的直接干預在學院內引起極大反彈。學院內發現非法張貼的反對新聞封鎖的黑色條幅，雖然條幅很快被學校保安摘除，但條幅的照片被上載到網上，廣為流傳。與此同時，學生利用新媒體號召學生參加在新加坡被稱之為「演說者角落」的芳林公園集會，抗議校方對學生媒體的新聞封鎖。出席這個集會的除了學生也有媒體工作者，集會的消息不但被路透社等海外媒體報導，也被眾多本地媒體報導，並在互聯網廣泛轉載 (Staff, 2008, October 5)。有關反對黨到訪，校園媒體被封殺和學生集會抗議的消息最終還是出現在《南洋紀事報》的版面，不但原本的新聞沒有封鎖住，對反對新聞封鎖活動的報導更加放大了上層本意封鎖的小新聞 (Hor, 2009)。

學院教師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文化，所受教育也不盡相同，難免對新加坡現行的新聞體制和媒體運作方式有不同看法，對在新加坡教授新聞傳播學有顧慮。學院在教學上採取充分信任教師的做法，課程設置上只對每門課教授的內容有基本要求；對具體使用何種教材，授課內容的細節和教學方法沒有任何規定，完全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多數教師在開始教學時對新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並不瞭解，自然也無法把新加坡的新聞傳播模式作為教學的重點，往往是以他們在海外所學的知識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只有當他們通過與學生課上交流和對新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有了較深入的瞭解之後才得以在教學中融入更多比較新加坡和其他國家新聞傳播環境的內容。雖然學院希望教師能在教學中更多融入與本地新聞傳播環境相關的內容，但並沒有強行要求每一個教師在教授每一課程都這樣做¹，對教師如何介紹和評論新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和體系沒有具體要求。在教學評估上，學院沒有專門的系統評估每門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方法，只是使用大學通用的教學評估體系，瞭解學生對課程的滿意程度。

在科研方面，學院只在論文發表數量和在何類期刊上發表有基本要求，而對於研究的領域、問題、方法和觀點沒有任何要求。受聘教師在入職後可以在自己專長的領域進行研究，也可以轉向研究不同的領域或參與跨學科研究。由於新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頗受爭議，以新加坡為樣本的研究難免會得出與現行體制相左的發現和結論，因此對新加坡現行體制的反思和批評時常出現在學院師生發表的論文中。在極個別情況下，學院教師和學生發表的論文也會受到外界的質疑，但

1 由於學院沒有對教學內容有具體的要求和監督，所以教學中也會出現一些漏洞。例如，學院有關傳播法規的一門課長期以來是由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美國教師教授的，但筆者從與在新加坡媒體管理局實習的學生訪談中發現，學生雖然通過課程懂得了很多法規產生的哲理，但對本地各類法規的知識仍非常有限。

在學院內領導從未對教師和學生所發表的論文就其觀點進行指責。當學院的一名優秀教師在 2013 年因為非學術原因被大學拒絕授予終身教職和續簽合同時，學院的教師和學生也分別以內部通信和公開信的方式對大學領導層的決定提出質疑 (Soh, 2013, April 30)。雖然大學的這一決定沒能最終改變，但學院師生對這一事件的反應受到主流媒體和網路媒體的關注，對公眾輿論造成一定影響。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南洋理工大學是相對較小的學院，但學院師生在大學事物中所發出的聲音遠超其所占大學師生的比例，這不單單是學院主辦校園報紙和有線廣播電視節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源於學院特有的文化傳統。新聞傳播教育的一個重點是培養學生對公眾事務的關注和興趣，讓他們從公眾利益出發尋找事實真相並提出自己的觀點，因此學院的師生在校內活動中也體現出傳播業者特有的文化傳統。在學院內，師生交流比較暢所欲言，領導對不同意見也比較寬容。在大學事物中，傳播學院的師生有較強的參與感並敢於發聲。

與寬鬆的學術環境相對應的是嚴格的考核制度。新加坡大學傳承了英國的考核制度，學生不但入學要通過統一的劍橋考試擇選，入學後仍然要面臨遠比西方和中國內地大學嚴格許多的考試制度。在學院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學院開設的每門課都要有期末考試，所有考試都是採取閉卷和匿名的方式在大學專設的考場舉行。隨著教學改革，一些實踐課程已經取消考試，更多的考試採取開卷的方式進行，但學生每學期仍然要在嚴密監考下的統一考場進行多門考試。沒有通過考試的學生在本學期不能補考，要等到下學期或下學年複讀同樣的課程再次參加考試。學生的各科成績是按等級比例分配的，只有少數學生能獲得 A 或 A- 的成績，所以學院平均 B 的學生在海外留學期間通常會取得 A 的成績。這樣的考試制度雖然會迫使學生學習期間過於專注書本知識，但對鞭策學生努力學習還是行之有效的。

教師考核在南洋理工大學 2007–2008 年進行改革之前是相對寬鬆的。南洋理工大學初建時是一所專注教學的大學，雖然對科研有一定要求，但沒有明確的指標。教師中除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在任教六年後可以獲得到 55 歲結束的終身教職外，其他國籍的教師都是採用合同制，每三年一簽。一般情況下，只有少數在教學上學生反映很差或無研究成果的教師得不到續聘。薪金的增長基本上隨時間積累，年終獎金差別很小。在 2007 年，大學對教師的聘用體系進行全面改革，所有教師包括已有終身教職的教師都受到重新審核，評估標準涉及教學、科研和服務三方面。符合大學標準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職稱的教師獲得到 65 歲為止的終身教職，符合條件的助理教授要等到第二、三個三年合同完成後進行評估，決定

可否升等並獲終身教職 (Andersson & Mayer, 2014)。在這一輪的審核過程中，學院有 30% 以上的教師沒能在合同結束後續聘。

在新的教師任聘制度下，教師招聘有了更加嚴格的評審制度，學院在招聘教師方面只有推薦權，最終任聘與否由大學教務長和一級學院院長組成的委員會決定。新任聘的助理教授要在三個三年合同（後改為三年加四年的兩個合同）內升等並獲終身教職，否則將面臨淘汰。這樣的任聘體系與北美大學的任聘制度相似，但由於新加坡大學數量有限，在一所大學拿不到終身教職也基本上失去在本地其他大學任教的機會，因此年輕的助理教授們倍感壓力。從這些年的經驗看，學院新升等的教師在論文發表的數量和品質上通常高於北美研究型大學的同輩，即便如此仍然有半數左右的助理教授無法升等或選擇在評審前離開。提升為副教授並獲得終身教職的教師在六年後有機會被學院推薦參加晉升教授的評審。鑒於目前全大學只有 15% 左右的教師獲得正教授職稱，而且這個比例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提升，正教授的評審更具競爭性。

除了嚴格的升等評審制度外，所有教師每年都要接受年終評估。每名教師要填寫統一的表格並提交個人簡歷，由學院五名正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對被評審人的教學、科研和服務進行評估，評估結果再由學院領導組成的委員會審核評定。所有教師會按大學人事部門設定的比率劃分為 A-D 四等，由人事部門根據評估等級決定每名教師的薪資增長和獎金數額（一般為 0-4 個月的工資額度）。年終評審與嚴格的任聘和升等審查相結合使得教師任教期間長期感受到壓力和挑戰，成為提升教學品質和科研成果的有效手段。

伍、與時俱進，銳意改革

過去的三十年見證了全球化和傳播技術的高速發展，這些變化自然影響到新聞傳播的發展。面對傳播業界的變化，新聞傳播教育必須不斷調整教學內容和方式。作為傳播教育的後來者，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通過不斷招聘新畢業的年輕教師在更新教學內容和方式上具有一定優勢，但除此之外學院也對課程設置和內容有意識地進行改革。

學院成立之初在參考了國際不同傳播教育模式後設立了新聞、廣電、公關與促銷傳播和傳播研究四個系，每個系都有明確目標為特定的專業領域培養人才。學生從入學第三年開始進入專業學習，由於各科系課程相對獨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系為單位的學生群體，學生鮮有機會修讀非本專業的高年級課程。隨著網

路和多媒體的發展，特別是當新加坡政府為了提高本地媒體的競爭力而允許本地報業集團辦電視和廣播電臺並允許廣電集團辦報紙之後（袁舟，2004 年 9 月 13 日）²，這種傳統的以系為單位的教學方式顯然不利於培養能夠適應網路和多媒體時代的傳播專才。

為了使教學適應現代傳播發展的需要，學院在 2005 年對本科生課程進行了重大改革。原有以系為基礎的課程設置被不同專業的核心課程取代，本科生在結束前兩年的通識課程之後不再劃分為新聞、廣電、公共與促銷傳播和傳播研究四個系的學生，學生可以從為新聞、廣播電視、電影、公關、廣告、傳播研究等領域設立的系列課程中選讀推薦的核心課程和輔助課程。學生可以專門修讀一兩個領域的課程，也可從不同領域的課程中挑選自己想要的課程。換言之，高年級的課程設置從「套餐」轉為「自助餐」模式，學生可以自由選讀有利於畢業後個人發展的課程。

學院的課程設置隨著大學整體課程設置的調整近年來一直在變化，總的目標是讓整個教學體系更加強調通識和跨學科教育，其結果是必修科目的減少和選修課程多樣化的加強。受大學推進跨學科教學與研究計畫的影響，學院內部也取消了原有的科系建制，各類課程由學院統一安排，根據媒體行業的發展趨勢不斷增加新的教學內容。例如，學院近年來利用本學院資訊科學的師資力量為傳播學本科生開設了資料採擷、分類、分析和視覺化方面的課程以適應大資料時代對傳播專業人士的要求。同時，學院也通過招聘新的師資力量開設和擴展了健康傳播和社交媒體方面的課程和研究。

陸、結語

在過去的 20 多年中，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和兩岸三地的新聞傳播學院共同經歷了傳播教育在亞洲大發展的時期。由於新加坡的社會體制以及傳播與教育環境與兩岸三地有很大區別，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教學科研體系與兩岸三地傳播學院，特別是中國內地的傳播院校，有很大不同。新加坡雖然在文化上可被看作是大中華文化圈的一分子，但它在社會制度和教育文化體系中融入了更多西方文化傳統，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建院和發展上體現了這一社會背景。

2 報業集團和廣電集團相互涉入對方領域的競爭雖然最終因為虧損而終止，但隨著多媒體技術的發展，兩家集團都先後利用網路開辦了多媒體新聞平臺。與此同時，公關、廣告等領域也逐步向多種媒體融合發展。這些變化迫使學院將教學重點從單一的文字或視聽訓練轉向培養多技能的新聞傳播業者。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國際學科排名榜上的優異表現得益於其國際化程度，學院在教師隊伍建設和科研成果發表方面的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新加坡歷來重視自己在各方面的國際排名，其大學教育近年改革的焦點也放在各項可以在國際間進行比較的指標上，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作為南洋理工大學的一部分，也自然隨著整個大學教育的改革而更多地運用國際性指標衡量自身的教學與研究。這樣做的正面效果是擴大了學院的知名度和提升了學院的國際排名，其負面影響是學院相對愈來愈忽視學院對亞洲傳播教育與研究發展的專注和貢獻，有違學院創辦者的初衷。另一方面，學院自由的學術氛圍加上嚴格但相對公平的考核制度，也是學院得以培養一支可延續的國際化教師隊伍和保持良好生源的重要因素。

教育機構說到底是為本國服務的，因此一所學院的成功與否最終是看其能否完成對本國所需人才培養的任務，其發展無疑也受限於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從這個意義出發，不同國家教育機構的優劣是無法用同樣的標準衡量的。國際排名所依據的只是教育機構共有的部分特徵，這樣的評比方式使得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這樣國際化程度高的學院在國際排名中受惠。作為亞洲傳播教育的一分子，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辦學模式不會輕易地照搬到亞洲其他地方，但它通過國際化程度提升學院國際知名度的經驗值得其他亞洲傳播教育機構借鑒。

參考書目

- 〈楊榮文：鼓勵國內外傳媒公司投資，我國希望發展成為區域性大眾傳播中心〉
 (1994年5月11日)。《聯合早報》，第1版。
- 袁舟(2004年9月13日)。〈新加坡報業控股的多媒體整合〉，《人民網》。
 上網日期：2019年7月23日，取自 <http://dengxiaopingnet.com/GB/14677/22100/37595/37596/2781049.html>
- 郝曉鳴、池見星(2012年11月28日)。〈用亞洲的經驗擴大看世界的視野〉，
 《中國社會科學報》，第B05版。
- 陳先哲(2017年5月2日)。〈重識大樓之謂與大師之謂〉，《光明日報》，
 第13版。
- 張汐瑩(2016年7月11日)。〈華校60年 飲水思情義〉，《聯合晚報》。
 上網日期：2019年7月21日，取自 <https://www.wanbao.com.sg/taxonomy/term/46/all/feed/page/6/0?page=487>

郭振羽 (2019)。〈新加坡的傳播教育：從播種到成蔭 (中)〉，《怡和世紀》，41：66-71。

新加坡文獻館 (2018 年 9 月 15 日)。〈李光耀關閉南洋大學歷史紀實〉。上網日期：2020 年 7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2090>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 (2018)。〈傳媒與娛樂產業〉。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edb.gov.sg/content/edb/zh/industries/industries/media-and-entertainment.html>

楊倩蓉 (2010)。〈郭振羽老師——新加坡傳播教育領航者〉，《提燈照路的人：政大新聞系 75 周年典範人物》。上網日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取自 https://comm.nccu.edu.tw/zh_tw/link18/people9/%E9%83%AD%E6%8C%AF%E7%BE%BD%E3%80%80%E6%96%B0%E5%8A%A0%E5%9D%A1%E5%82%B3%E6%92%AD%E6%95%99%E8%82%B2%E9%A0%98%E8%88%AA%E8%80%85-24605912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2019). ShanghaiRanking's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 2019—Communication. Retrieved April 17, 2020, from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Shanghairanking-Subject-Rankings-2019/communication.html>

Andersson, B., & Mayer, T. (2014).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ory: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 from the Lion City. In J. K. Hudzik (Ed.),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sation: Institutional pathways to success* (pp. 175-182). London, UK: Routledge.

APAC Outlook. (n.d.). Recording the growth of the media industry in Singapore. Retrieved April 1, 2020, from <https://www.asiaoutlookmag.com/news/recording-the-growth-of-the-media-industry-in-singapore>

Cham, T. S. (2014). *The making of NTU: My story*.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Cheong, D. (2017, May 4).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be aligned with needs of the economy: Ong Ye Kung. *The Straits Times*. Retrieved November 4, 2019, from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education-system-should-be-aligned-with-needs-of-the-economy-ong-ye-kung>

Goh, C. B., & Tan, L. W. H.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n S. K. Lee, C. B. Goh, B. Fredricksen, & J. P. Tan (Eds.), *Toward a better futu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 since 1965 (pp. 149-166).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gov.sg. (2018). Is it true our public universities reserve 20% of their places for foreign students? Retrieved July 3, 2020, from <https://www.gov.sg/article/is-it-true-our-public-universities-reserve-20-of-their-places-for-foreign-students>
- Harding, H. (1993).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660-686.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0003229X>
- HistorySG. (2015).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s established. Retrieved July 4, 2020, from <https://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5b196e5e-3204-4dd5-91d2-103474eaf0fb>
- Hor, J. (2009). Soft words over spiked story. *The Nanyang Chronicle*, 15(4), 6.
- Hugo, J. (2017, May 11). School’s out: How Singapore keeps university reserved for the elites. *The NewsLens*. Retrieved August 23, 2019, from <https://international.thenewslens.com/article/68084>
- Hukill, M. A. (1994).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Singapore: Responding to media needs. *Media Asia*, 51, 199-205. <https://doi.org/10.1080/01296612.1994.11726454>
- Kuo, E. C. Y. (1991).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Singapore: Themes, gaps and priorities—With a select bibliography.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 109-128.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9109359543>
- Kuo, E. C. Y., & Lee C. W. (2006).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Singapo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K. W. Y. Leung, J. Kenny, & P. S. N. Lee (Eds.), *Global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p. 211-234).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Lee, M. H., & Gopinathan, S. (2008). University restructuring in Singapore: Amazing or a maze?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6, 569-588. <https://doi.org/10.2304/pfie.2008.6.5.569>
-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9). Communication & media studies. Retrieved September 21, 2019, from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19/communication-media-studies>
-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9). 2019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Retrieved August 2, 2019, from <https://rsf.org/en/ranking/2019>

-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6). *Singapore 2006 statistical highlight*.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 Singapore profile—Media. (2017, September 5). *BBC News*. Retrieved March 3, 2020,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15966553>
- Soh, E. (2013, April 30). Students, faculty protest against rejection of Dr. Cherian George’s appeal. *Yahoo News*. Retrieved July 12, 2020, from <https://sg.news.yahoo.com/ntu-rejects-outspoken-professor-s-tenure-appeal-115504121.html>
- Staff, R. (2008, October 5). Singapore students protest university censorship. *Reuters*. Retrieved July 3, 2020, from <https://in.reuters.com/article/idINIndia-35804320081005>
- Wang, G. (1993).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926-948.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00032392>
-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2019a). Endowment fund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trieved October 24, 2019, from <http://www.wkwsci.ntu.edu.sg/aboutus/Endowment/Pages/Home.aspx>
- (2019b). Overseas opportunit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trieved October 24, 2019, from [http://www.wkwsci.ntu.edu.sg/programmes/Prospective Students/Prospective%20Masters%20and%20PhD%20students/Student%20Life%20and%20Development/Pages/Overseas-Opportunities.aspx](http://www.wkwsci.ntu.edu.sg/programmes/Prospective%20Students/Prospective%20Masters%20and%20PhD%20students/Student%20Life%20and%20Development/Pages/Overseas-Opportunities.aspx)
-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2020a). Our history.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trieved July 2, 2020, from <http://www.wkwsci.ntu.edu.sg/aboutus/Pages/Our-History.aspx>
- (2020b). About WKWSC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trieved July 5, 2020, from <http://www.wkwsci.ntu.edu.sg/aboutus/Pages/About-WKWSCI.aspx>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 Case Study of the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Hao, Xiaoming*

Retired Professor,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WKWSCI) of Singapor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as grown into a world-renowned communication school in less than 30 years, setting a good example for other Asian schools. Compared with communication schools in China's mainland,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WKWSCI performs better in international rankings based on its more internationally orient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which in turn are based on Singapore's unique cultural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the school's 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faculty. Other factors that ensure the schoo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e its free academic environment, strict assessment systems, and constant drive for change.

Keyword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sation, academic freedom, assessment systems

* Email: txmhao@gmail.com

Received: 2020.4.3

Accepted: 2020.9.16